温雄珍：身体里依然有山河

□本报记者 李墨波

温雄珍不太记得母亲的样子。母亲去世时她才上小学四年级。家里几乎没有母亲的照片，那个温暖的形象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模糊。

小学上到五年级温雄珍就不再念了。家里穷，负担不起她的学业，她开始出去打工。其实她的成绩是不错的，尤其作文写得好。在外打工的时候，她给父亲写信，父亲看着信里的文字忽然有些后悔，对她说要不然你去上个夜校吧。

温雄珍没去上，毕竟她小学都没毕业。她自己看书，身边能找到的书都拿来看。老板的儿子有一本《傲慢与偏见》，她去借，老板儿子还笑她，你能看懂吗？那段时间她最喜欢席慕蓉和汪国真的诗，会模仿着写一些诗，这些励志的文字让堂弟将她视为偶像。

后来结了婚，到了东莞，继续打工，最初是摆摊卖拖鞋，生意还不错，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坐老公的摩托车去石龙进货，路上会路过一个荷塘，夏天时开满荷花。荷塘边的路崎岖不平，摩托车走起来一蹦一蹦的，那些荷花在温雄珍眼里便上上下下跳跃。很多年后她都还记得这一幕。在她写诗之后，她觉得这其中充满诗意。

她还是喜欢看书，摆摊的时候看《红与黑》，看《白鹿原》，一个顾客见了说，这姑娘看懂吗？你看懂《家庭医生》就不错了。

2003年腊月二十七，快过年的时候，老公出了车祸，腿被撞坏了。于是整个家庭的重担便落在温雄珍一个人肩上。回想起来，那段日子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她白天摆摊，晚上把挣的钱送到医院。除了照顾老公，还要拉扯两个小孩。日子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再没有荷塘风景，只有奔波与喘息。大概有十年时间，她没有写过一个字，有次堂弟发信息问她，姐你现在还写诗吗？她的眼泪哗地流下来。后来她在诗里写道，“这几十年流水冲刷，我的身体早就没有了山河”。

生活艰难，有天晚上她跟老公吵了一架，自己跑到江边，看着黝黑的江水，生出要逃离这世界的冲动。但是想到自己就这么走了，几个孩子怎么办，她到底还是把自己拉回家。她又开始写诗，诗歌可以让她短暂地逃离。那是2015年，有了智能手机，她用手机写，写完就发在自己的QQ空间里。

她后来加入一些诗友群，因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大家聚在一起，切磋诗艺，交流经验。一些人看不起她，说她小学学历字都认不全，还写什么诗，但更多的人给她鼓励和帮助。有个叫“瘦石别院”的浙江网友鼓励她多写，会给她布置作业，写完给她修改，还有一位老师对她说：“你要用最轻的字句写最深的痛苦，如果从字面上看不到痛苦，却能感受到你的痛苦，那你这首诗就成功了。”

她在诗歌群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叫张默涵，是一个渐冻症患者，疾病让他只能坐在轮椅里，只有手指可以动。另一个叫黑子。他们三个最要好，温雄珍不开心的时候，他们就来安慰她：“想想小孩，他们懂事就是对你最好的回报。”三个人经常一起写同题诗，某人出个题目，大家一起写，比谁写得快写得好。张默涵写得好，总是拿第一。黑子写得最快，一天能写十几首，温雄珍则是字斟句酌，一天最多写一两首。——日进入诗歌的世界，那些忧愁和烦恼就都忘掉了。

2017年，温雄珍在企石镇的综合市场附近盘下一个小店面经营童装，终于不用再摆地摊。店里生意不温不火，然而到底是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空间。顾客不多的时候，她就用手机写诗。她把日常写进诗里，把生活写进诗里。综合市场有一个扫地的大姐，常过来跟她聊两句，大姐命运多舛，儿子去世，她一个人拉扯孙女。温雄珍把大姐写进诗里：“我喜欢看她打开瓶盖的动作，那里有悲伤，她总是抒得太紧。”

她的诗渐渐写出了名堂。老家的《广西文学》发了她的诗，还配了评论。2019年，她写了一首《追绿皮火车的人》投给中国诗歌网，被评为每日好诗，还在《诗刊》上发表了。她参加一个诗歌比赛得了一等奖，有人提出质疑，真是她写的吗？毕竟都没有人听说过她。评委专门要来她以前写的诗歌，看完后坚定地说，没错，一等奖就是你的！

这次比赛的奖金有3000元，让她很高兴。她最高的一次稿费是《作品》给的，给了6000元。但这么高的稿费毕竟是少数。零零星星的稿费对于她的生活来说只是小小点缀。为了维持服装店，她又打了一份工。每天下午五点去一家烧烤店上班，一直干到凌晨十二点半。虽然有些辛苦，但收入还可以，一个月20元，一个月能挣四五千。

对她的写作，老公以前觉得她是“中了毒”，现在会说：“写得还可以。”家里三个孩子也都大了，老大考上了北师大，毕业后在深圳当老师，老二在深圳的比亚迪打工，老三也快要高考了。老三问他爸：“我妈会写诗，你会干啥？”他想了想说：“我会做饭。”

后来老家的人也都知道温雄珍是一名诗人，她再回去的时候，村里人都叫她温老师。有一次一本年选选了她的作品，赠送给她20本，她带回去送给村里人，但是有要求：“真看才给，不许拿去垫桌脚。”

她被作为素人写作的典型，去参加东莞文联举行的研讨会。东莞文联跟花城出版社有一个项目，可以帮助素人写作者出书，这让她出一本诗集的梦想马上就能实现了，她想好了诗集的名字，就叫《东江水暖》。

温雄珍有时会想起母亲。有次她去舅舅家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跟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她在诗里写道：“我们共用一张脸，成功骗过所有人。”后来回去老家，她都喜欢去舅舅家，静静地坐一会儿。

曾为民：在文学的石材厂，没有一颗抑郁的石头

□本报记者 李墨波

柳冬妩是安徽人，高中时就喜欢写诗，常给《诗歌报》投稿。他记得《诗歌报》上有个人的诗写得很好，名叫田文笑。

高中毕业后柳冬妩来到东莞打工，最初他搞文印，接了很多广报的印刷工作，其中一家叫《环球石材报》。《环球石材报》上有副刊，发一些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有个叫曾为民的常在上面发。

曾为民是江西人，92年时他还在老家一家硫酸磷肥厂工作，爱上了厂长女儿。虽然厂长坚决反对，他还是迫了一年多。每天早上会买好煎饺和炒粉送过去。94年的时候，厂长松了口，但是曾为民没钱结婚。他就跑到深圳打工，边打工边写作。稿子投到《深圳特区报》等刊物，发一篇稿费少则80元，多则上百元。他还在《中国青年报》上开了专栏，连载《一个深圳打工仔的手记》，写打工人的生活。他给女朋友写信，三天一封，前一封还没收到，后一封已经发出。在信里他给女朋友讲深圳的样子，讲他的打工生活，讲他的思念。

这期间出过一次事，有次他爬梧桐山，被6个歹徒劫持，绑在树上。后来还绑了一对情侣，女孩被几个歹徒轮奸，男生跑下山去报警，武警包围了那座山，但歹徒已经逃之夭夭。两个月后曾为民在205公交车上发现了其中的两个歹徒，他一路跟着歹徒下了公交，然后叫谈路边训练的武警故士，将两个歹徒抓获归案。

当时刚设了沙头角冶安基金，曾为民因为被案有功，被奖励了3000元。他半年时间打工攒了3000多，稿费也有3000多，加上这笔奖金凑够一万元，就回去老家结了婚。

98年的时候，硫酸磷肥厂破产，曾为民和妻子都没了工作。曾为民跑去东莞打工，凭着一本发表作品的剪贴本，他获得了环球石材厂的工作。妻子随后也去广州新塘打工，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地。每到周末，曾为民就坐了公交，摇摇晃晃三小时出发去新塘看妻子。周一早上五点他再坐车返回东莞。三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如此，风雨无阻。

环球石材厂当时有28个东莞户口的指标，曾为民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第一个指标，在东莞安定下来，妻子也跟他来到东莞，一家人终于团聚。

他在石材厂一干就是25年，日日眼石头打交道。他见过全球各个地方各种品种的石头，白的，黑的，绿的，黄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块相同的石头。”在曾为民眼里，这些石头是有生命的。当一块石头切开，里面会有化石，会有恐龙蛋，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然后这些石头被工匠们精雕细琢成不同的样子，被赋予第二次生命。

他开始为这些石头写诗。写了一首又一首。每天跟石头都会见面，每有所感便凝结成诗。这些年下来也一共写了四百多首石头诗。

这期间出过一次事，有次他爬梧桐山，被6个歹徒劫持，绑在树上。后来还绑了一对情侣，女孩被几个歹徒轮奸，男生跑下山去报警，武警包围了那座山，但歹徒已经逃之夭夭。两个月后曾为民在205公交车上发现了其中的两个歹徒，他一路跟着歹徒下了公交，然后叫谈路边训练的武警故士，将两个歹徒抓获归案。

当时刚设了沙头角冶安基金，曾为民因为被案有功，被奖励了3000元。他半年时间打工攒了3000多，稿费也有3000多，加上这笔奖金凑够一万元，就回去老家结了婚。

98年的时候，硫酸磷肥厂破产，曾为民和妻子都没了工作。曾为民跑去东莞打工，凭着一本发表作品的剪贴本，他获得了环球石材厂的工作。妻子随后也去广州新塘打工，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地。每到周末，曾为民就坐了公交，摇摇晃晃三小时出发去新塘看妻子。周一早上五点他再坐车返回东莞。三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如此，风雨无阻。

环球石材厂当时有28个东莞户口的指标，曾为民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第一个指标，在东莞安定下来，妻子也跟他来到东莞，一家人终于团聚。

他在石材厂一干就是25年，日日眼石头打交道。他见过全球各个地方各种品种的石头，白的，黑的，绿的，黄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块相同的石头。”在曾为民眼里，这些石头是有生命的。当一块石头切开，里面会有化石，会有恐龙蛋，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然后这些石头被工匠们精雕细琢成不同的样子，被赋予第二次生命。

他开始为这些石头写诗。写了一首又一首。每天跟石头都会见面，每有所感便凝结成诗。这些年下来也一共写了四百多首石头诗。

这期间刚设了沙头角冶安基金，曾为民因为被案有功，被奖励了3000元。他半年时间打工攒了3000多，稿费也有3000多，加上这笔奖金凑够一万元，就回去老家结了婚。

98年的时候，硫酸磷肥厂破产，曾为民和妻子都没了工作。曾为民跑去东莞打工，凭着一本发表作品的剪贴本，他获得了环球石材厂的工作。妻子随后也去广州新塘打工，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地。每到周末，曾为民就坐了公交，摇摇晃晃三小时出发去新塘看妻子。周一早上五点他再坐车返回东莞。三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如此，风雨无阻。

环球石材厂当时有28个东莞户口的指标，曾为民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第一个指标，在东莞安定下来，妻子也跟他来到东莞，一家人终于团聚。

他在石材厂一干就是25年，日日眼石头打交道。他见过全球各个地方各种品种的石头，白的，黑的，绿的，黄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块相同的石头。”在曾为民眼里，这些石头是有生命的。当一块石头切开，里面会有化石，会有恐龙蛋，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然后这些石头被工匠们精雕细琢成不同的样子，被赋予第二次生命。

他开始为这些石头写诗。写了一首又一首。每天跟石头都会见面，每有所感便凝结成诗。这些年下来也一共写了四百多首石头诗。

这期间出过一次事，有次他爬梧桐山，被6个歹徒劫持，绑在树上。后来还绑了一对情侣，女孩被几个歹徒轮奸，男生跑下山去报警，武警包围了那座山，但歹徒已经逃之夭夭。两个月后曾为民在205公交车上发现了其中的两个歹徒，他一路跟着歹徒下了公交，然后叫谈路边训练的武警故士，将两个歹徒抓获归案。

当时刚设了沙头角冶安基金，曾为民因为被案有功，被奖励了3000元。他半年时间打工攒了3000多，稿费也有3000多，加上这笔奖金凑够一万元，就回去老家结了婚。

98年的时候，硫酸磷肥厂破产，曾为民和妻子都没了工作。曾为民跑去东莞打工，凭着一本发表作品的剪贴本，他获得了环球石材厂的工作。妻子随后也去广州新塘打工，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牛仔裤生产地。每到周末，曾为民就坐了公交，摇摇晃晃三小时出发去新塘看妻子。周一早上五点他再坐车返回东莞。三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如此，风雨无阻。

环球石材厂当时有28个东莞户口的指标，曾为民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了第一个指标，在东莞安定下来，妻子也跟他来到东莞，一家人终于团聚。

他在石材厂一干就是25年，日日眼石头打交道。他见过全球各个地方各种品种的石头，白的，黑的，绿的，黄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块相同的石头。”在曾为民眼里，这些石头是有生命的。当一块石头切开，里面会有化石，会有恐龙蛋，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然后这些石头被工匠们精雕细琢成不同的样子，被赋予第二次生命。

他开始为这些石头写诗。写了一首又一首。每天跟石头都会见面，每有所感便凝结成诗。这些年下来也一共写了四百多首石头诗。

黄立明：市井烟火，诗意人生

□本报记者 刘鹏波

在东莞的细村菜市场，有这样一个人。每天下午4点，市井菜市场开始热闹，忙碌到凌晨6点，收单、发货、整理蔬菜，日复一日。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看似普通的莲藕批发商，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诗人。

黄立明出生在湖北赤壁的一个偏远农村，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一个。父亲早逝，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孩子们的肩上。“那时候家里穷，连饭都吃不饱，我们只能把红薯丝掺在米饭里煮。”早年的经历，让他早早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艰辛。

黄立明自小就喜欢阅读和写作，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表扬。“那时候，我偷偷看了很多小说，像《苦菜花》《青春之歌》之类的。我就想，以后我也要当作家。”然而，命运并未如他所愿。高考失利，再加上家庭条件也不允许复读，黄立明只能进入乡镇企业打工，先后当过纺织工、保安和机修工，最终当上了副厂长，管理着几百号工人。

那个年代，文学风气正浓，人人心怀文学梦。厂里的文学爱好者办了一份叫《二月兰》的诗报，大家在此挥洒青春和才华。1992年，《工人日报》全国征文，黄立明的一篇散文《一帧淡蓝色的纸片》从十多万份稿件中脱颖而出，发在“七彩生活”栏目。他还在多家地方报刊发表过诸多诗歌、散文作品，这对黄立明坚定自己的文学梦产生了深远影响。

2001年，黄立明所在的工厂倒闭，他来到东莞打工。初到东莞，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年龄偏大，他很难找到合适的活。无奈之下，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打零工，搬运货物，生活过得十分艰辛。黄立明没有被困难打倒，半个月后，他决定做蔬菜生意。

先在小摊位上卖菜，后来在细村菜市场经营家乡湖北莲藕的批发，黄立明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坚韧，逐渐站稳了脚跟。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市，忙到凌晨6点才能休息。20多年如一日，只有大年三十休息一天，正月初一、初二都要出门摆摊。

在东莞立足后，黄立明整日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写作。直到新冠疫情暴发，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他才有了一些时间和精力重新写起诗歌。有时在漫长的通宵劳作间隙，黄立明会在凌晨三四点的灯光下，用泡沫箱当桌子，用圆珠笔在对联红纸的背面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有时候下雨，我就一边打伞一边写，写着写着泪流满面。”回忆起那段特殊的时期，黄立明感慨万千，把个人感受都写进了诗里。那时候，他写了一首关于袁隆平的诗，诗长435行，取名《世界神农》，以诗歌的形式展现了袁隆平的伟大事迹和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

“袁隆平的世界是水稻的海洋。他用一生的努力，让几亿人吃饱了饭。”黄立明说，“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袁隆平院士去世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他”。

2020年，黄立明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这是他多年坚持写作的成果。一首叫《东莞望月》的诗，是他的《中秋组诗》其中一首，诗中写道：“东莞此时中天月，问讯赤壁是否斟。素娥歌款穿云裙，与东同步心向北。”他的另一首诗《高铁赞歌》充满对时代的关注：“纵横勾勒巨古辽阔大地，穿山掠地乘空贴水。昆仑秦岭大行无阻，长江黄河淮水汉水飞渡。”

黄立明还关注社会的发展，计划创作一首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主题的长诗《蔚蓝之弧》，希望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大湾区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成就。他相信，诗歌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时代的记录者。

“我好浪漫，边喝酒边写诗，我和李白有得一拼。”黄立明的这番有感而发，也是他的无奈表达。每天凌晨收摊回家睡觉前，他有一小段自己的时光，他便一边小酌一边写诗。写好后，他会发给诗歌群的诗友们看，征求大家的意见。

他写常市场的烟火，写家乡的山水，写在东莞的奋斗历程，也写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东莞，像黄立明这样坚守梦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不曾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在平凡生活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不凡诗篇。

马益林：在生活的磨炼中一步步靠近文学

□本报记者 教鹤然

1992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马力镇的马益林，在2008年初中毕业以后，跟随父母来到东莞打工，先后做过西餐厅服务员、足浴店服务员、酒店水吧员等小工。有一次，父亲骑着自行车，后座载着16岁的他，顶着阳日当空，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询问是否招工。从白天找到晚上，俩人的嘴巴都干裂开了，父亲还是舍不得买一瓶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的景象。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在河南老板开的工艺品厂里面，找到一份通过模具加工制作塑胶挂件的工作。工厂规它包住，十多个人住在一间充满烟味、霉斑和污渍的大屋里，他和另外两个工友睡在铁架床上下铺中间的过道，一个破旧的床垫子就是他们的床。他说：“这段经历很短暂，要不是被问起，我可能永远都不会、也不愿想起来了。”

后来，父亲在工厂当保安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做模具的老板，让他去跟着学习。他从事冲压模具零件加工行业十余年，其间还考取了中南大学的继续教育，读机电一体化专业。在五金厂做学徒的时候，天天上晚班，可能是黑白颠倒，也可能是青春期的余韵，他那时非常喜欢古诗词，自己仿写后发在QQ空间里。虽然没什么读者，但那是文学在他心里生根的时刻。真正对他产生文学启蒙的作家是王朔，他在网络上“神浪”时接触到王朔“骂人”的语言艺术，跑去把他所有代表作读回来，并学着那种调侃的语言方式写作。后来，他读到了磨红的《生死场》，“我一直认为写作是妳揉造作的东西，但这时候才发现文学其实是真诚的”。他学着那种腔调写一些几百字的短文，被给他上过课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也就是诗人亦村看到，亦村列了一些书单给他，他才真正大量接触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马益林在生活的磨炼中一步步靠近文学，走上了文学之路。

不过，他发表作品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总是处于“投稿—拒稿—再投稿—再拒稿”的状态中。2016年，他把第一篇原创小说习作投给了《特区文学》，编辑东来加了他的微信，肯定了他的创作潜力。虽然那篇稿件并没有被录用，但他们却因此成为了朋友。东来把他拉进一些作者群和杂志群里，认识了郑在欢、魏思孝等青年作家。在郑在欢的引荐下，他与《西湖》杂志的编辑李嘉建立了联系，将短篇小说《十八岁的列车》投给了对方。第二天一早，李嘉给他回电话，非常兴奋地说：“这是我这两年看过的最好的一篇小说。”后来这篇小说发表于《西湖》2021年第1期，也获得了东莞市青年文学奖。他颇为得意地说：“我觉得这篇比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写得好！”

但很好的起点并没有让他的创作之路一帆风顺，接下来几乎所有的投稿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直到2022年底，在编辑赵志明的帮助下，他的一篇写梦境的短篇小说《浮游》发表于《青年文学》第12期新作家专号。在编辑顾坤妮的推介下，短篇小说《破爷》发表于《青年文学》2024年第1期，最新的短篇小说《三人行》将发表于《作家》2025年第5期。这篇他自认为很不满意的作品，最初投给《西湖》没有得到录用，又经过修改再投给了《十月》的编辑蒋在。还记得蒋在给他回电话的那一天，他正在模具工厂上班，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他顿不得擦去手上的机油，就接起了电话。“文学好像有很奇妙的能量，我只是一个东莞的普通工人，远在北京的名刊编辑和我离得那么远，但文学可以打通我们之间的隔膜。”虽然那通电话依然是委婉的拒稿，仍给他些许安慰。

去年下半年，在莫华杰的引荐下，他成为了东莞作家陈启文最年轻的徒弟。在这之前，他称自己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加入作协，没有参与活动，也没有熟悉的本地文友，一个人阅读，一个人写作，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文学，了解文学圈的朋友们都在读些什么，他办了“看理想”的会员，在模具厂的机床前，放了一个很小的音响。在一年的时间里，他收听了1154个小时35分钟，包括贾文涛《圆桌派》、许志强《20世纪欧美经典小说》、杨照《人心之谜：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思想宇宙》、刘文飞《审美的乌托邦：俄国文学100讲》、骆以军《故事便利店》、葛兆光《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等120个节目。

今年3月份，他从工厂离职，准备做全职作家。不过，刚离职之后的那两天，当文学已经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的时候，他反而什么都写不出来。除了打游戏、睡觉就是发呆，他感觉非常绝望。看着之前熟悉的朋友，逐渐变成各大刊物的“新宠”，他很迷茫，也很“拧巴”。“前年的时候我们还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文青，天天聊些愤世嫉俗的东西，突然看着他们一下子变得好火，我们也就说发怎么联系了。”但他不愿意去写那种过于迎合流行趣味的、找不到一点生活质感的东西。“我总是感觉自己没有以那么纯粹了，认识的作家朋友们越多，他们对我造成的改变越大。以前，我写小说就是要追求纯粹的，哪怕写的东西发表不了，但是有人喜欢看就很好。”

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他考取了广东师范大学的继续教育，即将读汉语言文学本科学位，最近正在着手采访东莞网红“妙粉姐”，打算写一个关于她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对他来说，还有无限的可能。

东莞素人写作人物志

温雄珍 曾为民 黄立明 马益林 机器人瓦力 苏烛 章新宏 赖海石

章新宏：载着沉甸甸的文学梦想，驶向无穷的远方

□本报记者 教鹤然 康泰华

章新宏在大学学的是体育类专业的体操专项，大学毕业以后，他分配到老家的一所学校当老师，他不满足于现状，很想出去闯荡。1992年，东风欲来满眼春。趁着“孔雀东南飞”的热潮，在这个夏天，他通过人才引进政策来到东莞。他与东莞的缘分是伴随着“春天的故事”开始的，秋天之后，就把根扎在这里了，在莞城小学当了一名体育老师。

当时，体育课的时间往往被其他课占据，家长和学校都不太重视。为了顺利给孩子们上课，他在体育办公室门口开设了一个名为“五环广场”的黑板报，作为宣传体育知识的重要阵地。他亲自写，亲自画，一个月更新一次。黑板报的内容包括国际国内重大体育赛事新闻、东莞市体育新闻和本校的体育资讯，哪个学生体育练得好，就可以成为“体育之星”。“五环广场”黑板报办得有声有色，孩子们也特别有学习和运动的动力。章新宏发现，“文体两开花”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结合文化教育，能让体育训练更有成效。

章新宏在莞城小学工作了6年，后来被抽调去建设小学做体育老师。2006年，经过公开选拔，章新宏从一名小学体育老师调任到业余体校做校长。当时的分管领导给他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这是一所挂靠在其他学校里的小学体校，只有一至四年级，学生念到五六年级需要转到其他学校继续就读。到了新的岗位，章新宏很快就确定了体校的办学理念：“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他说：“我到了体校以后，更深刻地意识到要借助文化的力量，改变别人对体育工作的看法。通过更丰富的形式，让别人感觉到，体育老师和体校学生也可以是很有文化的。”到任以后不久，他便充分展现文化和宣传的力量，办起了莞城体校的校报。

体育学校原是为国家培养和选拔有运动天赋的好苗子，他为校报取名《新苗》，并写下“春风送桃李，细雨育新苗”的发刊词。在发刊词中写道：“《新苗》是朴素的，清新的，自然的，更是充满生机的……她虽然还那么的稚嫩，但她诞生的意义却将久远深长。”从2007年12月28日到2012年7月6日，《新苗》共推出18期，每学期2期，每期4版，分别由“校园动态”“教学园地”“家长心声”“学习乐园”几个板块组成，由校长、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共同参与策划、撰稿、拍照、绘画，章新宏和印刷厂的美术编辑们一起商量排版、配色、印刷等事务，事事亲力亲为。这份报纸随着体校毕业的孩子们一起，在祖国大江南北传阅，远到台湾和海外，都有《新苗》的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苗》还会专门为体育学校的学生们开辟文学创作的栏目，刊发不同年级学生的诗歌、散文、童话、随笔等作品，还不定期附有老师点评。在《新苗》创刊四周年的特刊上，刊登了一组以“四季”为题的诗歌作品，这是由10位小学一年级的体校学生共同创作的组诗。章新宏特别得意地告诉我们，有一年，莞城体校的学生获得了东莞市作文比赛的一等奖。“全市的写作比赛，是我们体校生拿了第一名！”

“我的想法很简单，体校孩子不仅四肢发达，头脑更发达。既要强身健体，搞好体育；更要文武双全，重视文化素养。”章新宏说，想要改变别人的看法，得先从改变自己做起。他通过成人高考的方式，在潜江师范学院取得了英语本科学历。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也会用写散文的方式表达情感，并结交了很多文学的伙伴。最开始是在朋友圈分享，后来发在美篇上，没想到获得了不错的阅读量，还有人打赏。统计打赏和美篇的激励奖金，章新宏拿到了一万多块钱。钱虽然不多，但这份来自读者的鼓励是很真实的。“文学，真的带来了妙不可言的感觉。”2015年，他在文友的推荐下加入东莞市作协。2022年，他第一次参加了东莞举办的“同一座城，同一个家”征文比赛，在构思散文写法的时候，想到了自己与东莞的关系。当年他来到这里，并没有陌生感，而是像回到家一样自然。回顾人生，觉得许多重要决策和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都在秋天，于是动笔一气呵成写了散文《莞秋》，并获得征文的二等奖。回想起获奖之后的激动心情，他说：“好像一下子都敢有文学梦想了。”

章新宏认为，是文学把他心里的杂质清除出去了。“文学接纳了我，我也热情拥抱生活。”最近，他的散文集即将出版，反复推敲改了好几次书名，第一版叫作《那云居的山，那修河的水》，意为怀念故乡；第二版本叫作《第三赛道》，意为在教育、体育之外，开辟文学这条新的赛道；后来灵感涌现，定名为《榄沿东江》。他出生在江西自榄镇，榄是木槟的意思，在章新宏心目中，自己就像一只停泊在东江畔的木槟，载着沉甸甸的文学梦想，等待着合适的机会，驶向无穷的远方。

机器人瓦力：成为作家出版人，写作一条路——写！

□本报记者 刘鹏波

网络作家机器人瓦力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与别人告诉我他是一个脑满的人相反，瓦力不仅不沉默，还很健谈。第一次到东莞，他载我到酒店，一路上都用平缓的语调回答我的问话，向我讲述我想知道的关于东莞的一切。后来我发现，与粗糙的面容相比，瓦力的知识谱系异常全面，是相当有见解的思想法的人。

瓦力患有一种遗传性疾病。在瓦力成长阶段，由于医保、家庭经济等原因，他只能得到微薄的治疗，导致他的踝关节、肘关节再到膝关节，无不饱受病痛摧残，逐渐增加着不可逆的损伤。

“小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自由奔跑，不能参加体育活动。”瓦力回忆道，“学前班时，老师组织唱歌跳舞活动，我都只能坐在角落，看着同学们尽情玩耍”。这让瓦力逐渐变成了同龄孩子眼中的“局外人”。

瓦力自小就对文字敏感，热爱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位姐姐的影响。大姐上中学时，老师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成为瓦力最早的阅读资源。不到10岁，瓦力便读了《鲁滨逊漂流记》《三国演义》等书。随着年龄增长，瓦力的阅读范围不断扩大。他开始读经典外国文学，如托马斯·哈代、劳朗特姐妹的作品，以及狄更斯（远大前程）等。他还喜欢阅读《意林》《青年文摘》等杂志，以及家里订阅的报纸。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很长一段时间，瓦力的病只能采取“按需治疗”而非根治的“预防治疗”，到了初中二年级，由于右膝关节频繁出血，瓦力不得不坐上轮椅，最终导致镣学，逐渐与同龄人脱节。这对成绩优异的瓦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瓦力独自留在家里，自学姐姐们读过的教科书，也通过互联网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学习各种知识。

因为没法继续接受教育，又不太容易出门与人接触，成为一个网文读者后不久，瓦力意识到在家写网文是他未来的某种出路，至少是他能做的事情。“写网文不是体力活，网文产业又很有前途，我有兴趣、有天赋。”当时的起点中文网以网络作家血红为例进行宣传，号称其日更万字、年入百万，这让瓦力觉得似乎找到了人生方向。

“我在起点中文网写过很多不同的题材类型，一直在寻找着更好的自己。”“机器人瓦力”这个笔名便诞生于2011至2012年的时候。“这是一部都市娱乐文，是我写作生涯中第一次大成功，在当时是一部现象级作品，成绩丰常好，并且得到网文圈的众多编辑、大神等的推荐。”《最佳导演》的成功，坚定了瓦力在写作之路上走下去的信心，也让他确信了自己有写作的天赋。

“天赋可以成就人，也可以造成局限。《最佳导演》之后，我开始对写作有了更多的疑问与会困，陆续尝试起玄幻、仙侠、科幻等类型。这些作品在商业上都没有取得太多成功。”瓦力表示，他陷入了一段时间的迷茫期，为了走出困境，他重新开始大量阅读，并就写作本身进行思考。

让瓦力走出低谷的是《黎明医生》。这部作品于2019年初开始创作，结合医学、克苏鲁、惊悚等当时流行的元素，是瓦力创作“新怪谈”类型小说的开始。这部作品的成功则可以最佳导演》的重演：上传后成绩步步走高，广受圈内外好评，后来还拿到不少奖项，作为百佳网文之一入藏国家图书馆。

“我认为《黎明医生》的成功，是因为新奇。‘怪异惊悚医学’这个角度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网文市场的一个口子。”瓦力说，“这也要得益于我大姐提供的专业咨询帮忙，她是医学博士，当过多年临床医生，让我可以写出专业、翔实、可信的医学细节。又因为遗传疾病给我带来的对于病痛的理解与遭遇，这是一部我命定要写的作品。”

2020年8月到2023年8月，各方面的治疗条件已经到位，为彻底解决多年的腿伤问题，瓦力又一次暂缓了自己的写作，在看病、手术、康复之间度过，完成了右膝关节的全膝关节置换术。其间，他写了赛博朋克科幻《夜行骇客》、都市传说怪谈《异体天王》，成绩都一般，“我知道，它们总是和我的身体问题纠缠在一起，让我无法专注、连贯地完成创作”。

腿伤彻底康复后，瓦力又到了一个瓶颈期，问题不是怎么写，而是怎么生活。“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场荒诞、虚无的独角戏，所以我决定先停笔，出去寻找一下‘戈多’，认真生活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瓦力到处游玩，参加东莞作协举办的各种活动，认识了一些师友，“我正在补全着人生中很多遗落的、停滞的、缺失的东西，变成一个更好、更快乐的人”。

谈到写作，瓦力认为，那像是“吃饭、喝水、呼吸一般的必需品，写作早已成为我之为我的一部分，是我活着的方式”。每当写到一个高潮情节，他都会感受到内心的激荡，“那是一种深深的宁静，仿佛自己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我会很感动，感慨自己何德何能，竟能有此心流”。

瓦力说他要感恩这个时代，让像他这样的普通人，也能通过写作发出声音，被很多人看见。他正计划写一本民俗题材的新怪谈小说，已经读了大量书籍，希望这次不以成绩为考量，更好地享受写作本身。他始终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他定能在网络文学的世界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也依然为自己的学业梦想努力着，希望通过自考等方式完成当年错失的学业，拿到本科学历。等未来有机会，他想去香港或国外留学。

苏烛：写作一定会获得来自未来的回答

□本报记者 康泰华

第一次碰到苏烛，东莞文联的工作人员笑称，这位“90后”小伙是来搞文学的“富二代”。苏烛的父母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湖北来到东莞打拼，自手起家，创办了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2018年产业转型，父母把厂子卖掉，一直在国外生活。

其实，“富二代”或者“厂二代”是苏烛身上最不值得提起的“标签”。这个标签的另一面，是他翻转的人生：他与妹妹跟随爸妈在东莞待到小学毕业，然后回湖北老家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老家上了初中和高中。作为进入青春期的留守少年，苏烛在老家遭遇了艰难的精神困境。后来，他考上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每年大学的寒暑假，主动到父母的工厂里劳动，与工人同吃同住，熟练掌握了激光焊接、生产叉车、模具加工等工厂流水线的每一个环节。他发在《作品》的组诗，就是他在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写的，是以工厂经验为题材的创作投稿。

现在，苏烛在东莞生活和工作，开设了一家青少年硬笔书法工作室，一边教孩子写字，一边写诗。苏烛聊起在家乡作为留守儿童读书的六年。他说，小时候生活非常困难，父母常常就在工地睡，一周全家的生活费只有50元。后来，父母生意忙碌，无暇分身，只能将自己和妹妹送回湖北老家，让老人帮忙照顾。

苏烛觉得，在老家的时光非常漫长。“你可以想象，每一天回到家感得最多的事，就是从学校门口回家的路上，怎么才能不被别人打和勒索。我记得我打架没有后招，经常去小镇的一座水塔上，吹吹风，看着下面的竹林发呆，到天黑了才在家里走。因为天色暗了，爷爷奶奶看不见我受伤的样子。”

苏烛说，有时候也瞒不住，奶奶发现他嘴里流血了，就只能说自己磕的。不止青春期的苦闷，还有遭受的歧视，亲情陪伴的缺位，身世的变故……从东莞到老家，12岁的苏烛几乎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复杂性。他懂事很早，因为明白只有打碎自己再重建，才有可能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苏烛获得了来自家人的救赎。“在文学里，我找到了跨越人格与时代的共鸣。两个灵魂隔着遥远无尽时空的相拥。我的成长，以及相信自己打碎和重建的过程，克服走向绝望、滑向虚无甚至犯罪的深渊，文学的作用，至关重要。”

大学期间，苏烛读了很多历史著作，也看了很多文学作品，对一切能尝试的文学体裁都进行自觉的训练，比如小说、散文、辞赋、古体诗、现代诗等。“读书很重要，它让我了解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同类。所有诗人都是未曾谋面的亲人，语言是我们共有的血统。在读诗、写诗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所有疼痛在此刻流向一颗巨大的心脏。”他常常感觉，“所有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心灵们，在此刻，与我一同流泪”。

苏烛选择新诗作为表达的方式，因为现代汉语诗歌还存在很多未曾抵达的疆域，也更符合当下时代的表达，写作是一种对世界的凝视，苏烛的诗歌涉及生命、爱、死亡、存在等各式各样的母题，他试图以语言的哲学本质抵达诗歌的“未至”之境。

苏烛说，自己被贴上“富二代”的标签，但自己一天都没过过所谓“富二代”的生活。大学毕业之后，在家全职写作两年。虽穷困潦倒，但从未伸手向父母要过钱。可父母依旧不同意他“不切实际”的想法，希望他要么找份稳定工作，要么接手家业，管理工厂。苏烛最后选择搬出去。那个时候，内心选择与外在境遇的冲突，让他遭遇“无尽的碰壁”，但仍旧没有放